

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近
思
錄
全
譯

(修訂版)

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

「南宋」朱熹 呂祖謙 撰集 于民雄 譯注

貴州出版集團
貴州人民出版社



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近思录全译

(修订版)

[南宋]朱 熹 吕祖谦 撰集 于民雄 译注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思录全译/(宋)朱熹,(宋)吕祖谦编;于民雄译注.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 12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ISBN 978 - 7 - 221 - 08379 - 1

I. 近… II. ①朱…②吕…③于… III. ①理学 - 中国 - 南宋②近思录 - 译文 IV. B244. 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0218 号

书 名 近思录全译

著 者 [南宋]朱熹、吕祖谦 撰集

译 注 于民雄

责任编辑 李立朴

装帧设计 余强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字 数 340 千字

印 张 24.5

定 价 36.80 元

再版说明

出版的境界是：为饥作浆，为旱作润，为冥作光，为往圣继绝学。《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担当这一历史的重托，挟着春风走到了学人和国学爱好者的面前。

书似青山常乱叠，眼光如炬淘金来。《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推出，即以权威、精到、普及的面貌风靡整个书界。本套丛书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但多年断档，令人怀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名著全译，多以三五本的规模推出，而今天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出手尽显大家气度，一次集中推出五十种，满足眼睛与心灵的饕餮。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浩如烟海的历代名著，就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字不仅记录了中国古代各个方面的历史与人文，物质与精神，成为后来人的精神家园，而且对中华民族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但古人留下的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当下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且以往坊间的不少古籍今译的读物，大都难尽人意：

——选译本。如《国语选译》《诗经选译》等。了解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人知道，“选”是一种评论的方式。鲁迅先生曾指出，如果对陶渊明只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不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类“金刚怒目”式的作品，那就很难使读者对陶渊明的“全人”有完整的认识，若“再加抑扬”，就“更离真实”了。所以说选译本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白话本。如《白话史记》《白话搜神记》之类。这类今译本有的置原文于不顾，随意增删敷衍，从严格意义上已不是原书；有的译文尚称严谨，但无原文对照核查，欲引用古人文句还要另觅原书，难称

人意。

——单译本。这类书最多，译文之外附有原文、注释，其中也不乏质量较高者。遗憾的是见木不见林，缺乏学术系统性，读者买到一本算一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很难达到全面。

本丛书在策划之初就考虑到避免以上各种译本之不足，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融译注为一炉，俾使社会各界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之完整原貌，有利于当下人文精神建设，又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译介，乃延聘海内学界通人，精选史有定评之夏商迄晚清经史子集四部，以全注全译形式重新装帧、重新校勘整理出版。所选各书前言对该名著之时代、作者、内容、成就、文献版本皆有详赡说明，各篇各卷前有简明扼要的题解，原文选用业经整理的善本，注释采用学术界公认的成果，译文强调忠实原文、通达流畅。

书行天下，道亦随之，既有品味，又有普及，为大家营造出一片文化底蕴深厚、知识境界广博、思想空间深邃的精神沃土，是《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的孜孜追求。此次修订是在前辈学人呕心沥血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认真的审读和勘校，是在“国学热”基础上的一次新的提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亦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今日重现书界，必将旋起一种新的阅读风暴。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形成当代的人文精神有着重要意义，在现代化人文化的进程中对开启今人智慧、滋养今人心灵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经典不腐更不朽，它是源远流长的活水，天光云影，亘古永在。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年9月

前言

《近思录》成书于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吕祖谦合编。书名取《论语·子张》“切问而近思”之义;内容择自《太极图说》《易通》《西铭》《正蒙》《经学理窟》《二程遗书》《易传》等有关著述,集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和张载的主要言论而成。全书分为道体、为学、致知、存养、克治、家道、出处、治体、治法、政事、教学、警戒、辨异端、观圣贤等十四门,凡六百二十二条,为阐述儒家性理的概论之作。

—

《近思录》既为朱熹、吕祖谦合编,又全面展现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基本思想,故该书可视为双重合作的产物。了解《近思录》,与了解上述六人的生平、事迹、思想有关,亦为解读《近思录》提供背景知识准备。职是之故,有必要对朱熹等六位学者作一简要介绍。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晚号晦翁等。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居建阳(今属福建)。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登进士第。后历任泉州同安主簿、知南康军、知漳州、秘阁修撰等职。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落职罢祠。时韩侂胄专权,党禁猖狂,其学被目为“伪学”。方是时,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后党禁松弛,其学亦渐得见用。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朱熹被赐谥为“文”,旋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理宗手诏: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及朱熹“从祀孔子庙庭”。

朱熹早岁从父朱松学,后师事李侗。一生孜孜不倦,“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①,”堪称古代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哲学上,朱熹认为理、气不能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②。”但又断言理为形而上之道,理是本,逻辑上先在;气为形而下之器,气在后。道德上,朱熹强

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③。”人的存在依归，指向“天理”；人通过“居敬”、“穷理”的道德实践工夫，实现人的目的；复归“天理”，即是人的完满——它内在于人的神圣性与合目的性。知识论上，朱熹强调“即物穷理”，知识源于经验，“格物”是获得知识的前提。

朱熹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其思想被视为儒家正统，支配中国思想界达六百年之久。其主要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太极图说解》《资治通鉴纲目》等，以及后人编纂的《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

吕祖谦(公元1137—1181年)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中进士第。历任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著作郎等职。与朱熹、张栻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全祖望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④。”吕氏学术折中朱熹、陆九渊之学，又吸收永嘉学派经世致用思想，自成一派，人称“婺学”，影响颇大。

吕祖谦为学主“明理躬行”，崇尚讲实理，育实才，求实用，反对空谈阴阳性命之说。主张治经史以致用，重视历史研究与文献整理，提倡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智慧。凡此种种，开浙东学派先声。著作有《东莱集》《东莱左传博议》《吕氏家塾读书记》《东莱书说》等。编有《宋文鉴》《古文关键》等。

周敦颐(公元1017—1073年)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因筑室庐山莲花峰下的小溪上，取营道故居濂溪以名之，后人遂称濂溪先生。曾先后任分宁县主簿、南安军司理参军、桂阳县令、大理寺丞、合州判官、虔州通判等职。晚年为提点广南路刑狱、知南康军，“为政精密严恕，务尽道理^⑤。”

周敦颐为二程师，其再传、三传弟子有杨龟山、罗仲素、李延平、朱熹等，周氏遂被奉为宋代理学开山祖师。

周敦颐依据《易传》《中庸》及道家与道教思想，构建以“太极”为本体创化阴阳万物的宇宙生存论模式，且为儒家道德人性论确立形上根据，对后世理学发展有开创作用。著作有《太极图说》《通书》等，后

人编为《周子全书》。

程颢(公元1032—1085年)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河南洛阳人。少时受父命,与弟颐同师事周敦颐。嘉祐年间,举进士第。曾为上元主簿,晋城、扶沟县令。为官廉洁,有政绩,后经吕公著推荐,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对王安石新政持有限反对立场。在洛阳讲学十余年,弟子有“如坐春风”之喻。为理学创始人之一。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谥纯公;淳佑元年(公元1241年),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

程颢著作有《定性书》《识仁篇》等。后人所编《遗书》《文集》《经学》等,收入《二程全书》。

程颐(公元1033—1107年)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河南洛阳人。颐幼聪敏,年十八,上书阙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论,以王道为心^⑥。”又游太学,其文为胡瑗称道。由司马光、吕公著推荐,受诏为西京国子监教授、秘书省校书郎,旋提为崇政殿说书。哲宗时,被斥为奸党,削籍流放涪州。徽宗即位,被赦还洛阳。一生不喜仕进,讲学达三十余年。与其兄程颢同为理学奠基者,世称“二程”。嘉定十三年,谥正公;淳佑元年,封伊川伯,从祀孔子庙庭。

程颐著作有《易传》《颜子所好何学论》等。后人所编《遗书》《文集》《经学》等,收入《二程全书》中。

程颢、程颐思想基本一致,其范围不出天理本体论、心性人性论、道德修养论。细微差异为:程颢为学以“识仁”为主;程颐为学以“穷理”为本。“二程”学说后为朱熹承继与发展,世称“程朱学派”。

张载(公元1020—1077年)字子厚。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世称横渠先生。少好谈兵,“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许^⑦。”后承范仲淹教诲,致力《中庸》。出入佛老,究其说,终无所得,返求之《六经》。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举进士第,为祁州司法参军、云岩令。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除崇文院校书,与朝官不合,辞官西归故里。

张载讲学关中,故其学称为“关学”。为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之一,理学创始人之一。以恢复古代井田制为政治理想。提出“太虚即气”说,肯定“气”是充实宇宙实体——“气”聚散变化,形成万物。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主张通过“变化气质”,成就至善的“天地之性”。著作有《正蒙》《易

说》《经学理窟》等,编入《张子全书》。

二

中国学术,源远流长。自先秦子学以降,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起伏此起,洋洋大观。宋代理学,承继孔孟儒学,亦批判、吸收佛道思想,自成一体。理学即人学,亦即道德形上学。集大成者朱熹,其思想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一脉相承。不言而喻,《近思录》作为集中代表周、二程、张基本思想的作品,在理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编排次第,符合朱熹哲学体系的内在价值与逻辑理路。

理学是系统化哲学体系,本体论构成整个思想大厦的基石。故《近思录》十四门中,《道体》排列第一,开宗明义直指大本大原。周敦颐说: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⑧

这即是著名的“太极”本体创化万物的宇宙生存论模式。但,从这一宇宙论,周敦颐引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的价值指归。张载亦然。张载说:“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⑨。”但,从气一元论,张载引出“立天地之大义”、“无非教也”的价值结论。从自然本体引出价值,建构道德形上学,是理学的本质所在。质言之,自然本体即道德本体。自然本体无非抗拒佛教空幻论的批判武器,在儒学心性论体系中,它只具有从属地位。宋儒所谓的“天”、“理”、“道”——作为本体的不同称谓,是一切价值的终极来源。程颢说:“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⑩这一本于儒家经典的概论,表述的正是天人合一的理念。儒家的真精神,从“天理”开出,亦内在于人心,它先验地赋予人的神圣性。所谓“体道”,即体悟性理至善的原理,在根本点上把握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学”属于经验范畴。但在儒学道德形上学体系内,“学”与终极价值密不可分,受内在性理牵引,指向并成就完满人格。“学”是儒家

的传统。“学”作为道德主体的实践活动,具有广泛的含义。《近思录》所列的《为学》《致知》《存养》《克治》诸门,大致属于“学”的范围。

人性善——真实的道德自我内在人心,是宋儒的先验设定。但,人内在的善性并不等同于实存的人格。完满道德人格是修养的结果。善性只是完满化的可能,“学”作为实践工夫,实属完满化的必要条件。

“学”以圣人之道为终极归依。圣人之道作为历史实在,展现在儒家经典之中,它集价值理念、历史智慧、文化精神、人格理想于一炉,代表整全真理。《六经》及《论语》《孟子》以文字载道,但决非文辞而已。体悟儒家真精神,不啻读经的根本路向,故“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于道者^①”。经有难易之别,故宋儒强调循序渐进之法。程颐说:“初学入德之门,无如《大学》,他莫如《语》《孟》^②。”读经由浅入深,于一事一义理会,学习领悟不辍,是求道明理的工夫。所谓“致知”,即在“格物”基础上,最终达到对儒家义理的全面把握。

圣道体用一源,即体即用,知行一体,相互作用。但体用、知行在概念上各自具有独立的含义。“致知”为人性完满提供知识论支援,但日用道德学问是“天理”的具体落实。理事的圆融表征体用、知行的统一。宋儒注重问学,强调在伦常日用中提升自己,依据的是儒学实践论的本质要求。它体现在方法、要求、过程、态度、意义等方方面面,构成一学道成圣、相互关联的有机系统。

方法上,宋儒有一套朴素而切实的经验:

“人之蕴蓄,由学而大。在多闻前古圣贤之言与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③”

“孟子才高,学之无可依据。学者当学颜子,入圣人为近,有用力处^④。”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者废其一,非学也^⑤。”

“朋友讲习,更莫如相观而善工夫多^⑥。”

如此等等,止为大略,亦可见宋儒对方法的重视。方法有特定功用,但方法内在于目的。目的实现的前提是立志。所谓“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⑦”,“先立其大者^⑧”,是学圣人之道之应然之义。志纯粹如一,与外在功名、得失、毁誉无涉。故宋儒对一切私欲杂念持否定立场,阻断一切“义”外觊觎之心。志超越时空制约,与空谈性命格

格不入；志同时有待日用证验，伪志必然半途而废。志要求自觉陶铸锻炼，成就道德人格具有主动性、严肃性、长久性、艰巨性，不可能一蹴而就。宋儒之所以主“诚”、“敬”为本，守护心性，直指“天道”（如“毋不敬，可以对越上帝^①”，“涵养吾一^②”），亦倡经验论路径，格一事一物，力行致用，基于存在论的神圣律令，两者相互发明，相得益彰^③。

《家道》讲齐家。齐家是儒家传统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条目之一。孝弟是修身之本，宋儒注重齐家，自在情理之中。家系人与国之中介，是社会的缩影。家庭反映社会面貌。饮食起居、人情世故、交往应酬、婚丧嫁娶，构成生活本身。《家道》所举，不乏经验教训之谈：

“世人多慎于择婿而忽于择妇。其实婿易见，妇难知，所系甚重，岂可忽哉^④。”

“人无父母，生日当倍悲痛，安忍置酒张乐以为乐，若具庆者可矣。^⑤”

但家庭生活琐细实际，不胜警戒；警戒有针对性，例证有限定性。故齐家，必须把“多”抽象为“一”，以为基本原则。程颐说：“正伦理，笃恩义，家人之道也^⑥。”依据人伦秩序的内在要求，遵从仁义孝弟的道德精神，家庭人际关系及生活遭遇之种种，可以迎刃而解——，是原始儒家的基本观念，也是宋代理学家的基本观念。

儒学与佛、道哲学不同，是入世之学。治国平天下作为儒家社会政治理想，要求儒者参与政治。《近思录》中《出处》《治体》《治法》和《政事》诸门，大致属于儒家政治思想范畴。

济世是士人的当然之理。“圣贤之于天下，虽知道之将废，岂肯坐视其乱而不救^⑦？”但作为现实选择，儒家并非无条件、无原则地鼓动士人投身政治。出仕是儒者的政治切入点，亦代表士人的积极姿态，但退隐决非意味背离救世原则。士人可以根据世道时势之几，保留退隐的权利。退隐基于不得已，并内含俟机而作。出仕虽内在于儒家政治理念中，“然去就取舍，唯义之从^⑧。”孟子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⑨。”孔子的明智策略，代表宋儒出处观的立场。

儒家的价值理念需要在历史文化中落实，士人出仕从政，履行的

是责任与使命。毋庸置疑,儒家的终极关怀指向人间理想国的建立。但儒家的社会理想,本质上是道德观念的投射,修身作为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前提,使政治附属于道德,亦使儒家政治哲学具有强烈的精英政治色彩。这一道德——政治论,起源于上古时代,孔子集大成并奠定基本范式。宋儒关于政治建构的学说,是孔孟原创思想的支脉,精神不出儒家藩篱。宋儒说:

“得邱民则得天下。^②”

“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③”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天下之治乱,系乎人君仁不仁耳^④。”

“治身齐家以至平天下,治之道也。^⑤”

这就是儒家的道德——政治论,概言之,即“内圣外王”之道。宋儒反复推崇的所谓王道、仁政、礼制,反复张扬的所谓诚敬、公心、爱民,反复批判的所谓霸道、邪心、暴力等等,彻上彻下包含在“内圣外王”之道中,凸现儒家一脉相承的道德——政治体系的基本价值理念。

《教学》乃经验之谈,但儒家传统教育原则、目的、方法蕴含其中。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均以桃李满天下著称于世,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教学》一门凡二十二条,虽不足以概周、二程、张教育思想之全貌,但摘选精当,可窥其本旨。宋儒认为,成就君子人格非一朝一夕之功,亦不离一时一事的社会实践。故宋儒强调幼儿教育,主张“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远者^⑥”,日常生活的事事物物,都与培养理想人格息息相关。宋儒的教育思想,是方法论与目的论的统一,最好的表述是程颢所说的“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自洒扫应对上,便可到圣人事。^⑦”宋儒关于教学相长、恪尽职守、因材施教等生动表述,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财富。

《警戒》一门,亦经验之谈,要在阐明事理,让人警省。人生遭遇,大致祸福、是非、公私、荣辱之间,以克己为本,以警戒为法,可以抑制私欲,可以减少谬见,可以避免耻辱,可以成全人格。宋儒认为,就道理而言,警省之所以必要,因为人时时有落入陷阱的可能。越是人们不加注意的地方,越是真实的危险;越是人欲耽恋的对象,越容易招致损害。贪图逸豫是人之常情,但宋儒则认为“处豫不可安且久,久则溺

矣^③”，最终导致身败名裂。计较得失利弊，亦常人难免，但宋儒认为，贪利害义，有损人格，得不偿失。关于警省，宋儒不乏发人深省之言：

“富贵骄人固不善，学问骄人，害亦不细^④。”

“虽公天下事，若用私意为之，便是私^⑤。”

“阅机事之久，机心必生。盖方其阅时心必喜，既喜则如种下种子^⑥。”

《警戒》属于儒家修身范畴，其主旨不出义利之辨，但其特定的视角与经验，构成中国传统的人生智慧。与老庄的出世超然之道不同，儒家的修身警省之道，高扬的是义理道德境界，不可视为守身全命的处世哲学。

在儒家看，儒学代表真理，其他种种学说基本上被视为异端邪说。孔子本人就提出过“攻乎异端^⑦”的口号。孟子辟杨墨，韩愈批佛老，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宋儒捍卫孔孟之道，《辨异端》即彰显宋儒与佛道思想势不两立的价值立场。^⑧其基本立论是：佛教空幻说、轮回说、道教神仙说、飞升说等等，皆不足为据，属虚妄之列；佛教出家说，背弃纲常名教；佛教生死说，蔽于小我私欲，与儒家公道大相径庭；即使佛教思想与儒学有一定相同点，但佛教“本领不是，一齐差却。^⑨”如此种种，毕现宋儒之倾向。平心而论，宋儒对佛道的批判，激烈有余，而说理不足，有失之于武断之虞。

《观圣贤》凡二十六条，阐述儒家道统，亦集中宋儒对历史上儒家著名人物的评价。对于儒家圣人，宋儒崇敬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如程颢把孔子说成是天地精神的体现，无以伦比。在儒家，这一评价自是当然。朱熹认为，儒家道统自孟子后，中断千年，其间有荀子、毛茌、董仲舒、扬雄、诸葛亮、王通、韩愈相继出世，他们“立言立事，有补于世教”，但“未能传斯道之统^⑩”。不言而喻，上述诸人依朱熹所言，算不上大儒，不能真正承传儒家真精神。故程颢说：“荀卿才高其过多，扬雄才短其过少^⑪。”荀扬都有缺欠，自不待言。至于诸葛亮，程颢说：“诸葛武侯有儒者气象。^⑫”但又说：“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则未尽^⑬。”依然算不上完满。

宋儒得儒学真髓，传儒家真学。朱熹认为，正是因为周敦颐、程

颢、程颐、张载的出现,才使“圣学复明,道统复续。”^⑤这是极高的评价,庶几可与孟子、颜回比肩。

《观圣贤》最后几节介绍周、二程、张生平事迹、思想学问。其清旷高远的气象、廓然大公的境界、立人立己的精神、恬淡洒脱的志趣,依儒家标准,堪称人世楷模。

《近思录》从形上本体缘起,大略循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穷理尽性、存养迁善、齐家育人的路径,到治国平天下及儒家礼法文化制度,终而批驳佛道异说而彰圣贤道统,全面系统反映程朱理学一系的价值、观念与立场。朱熹、吕祖谦对《近思录》极为重视,认为此书是学习周、二程、张四子,进而学习《六经》的阶梯,“循是而进,自卑而高,自近及远”^⑥,足以使学者“得其门而入矣”^⑦。《近思录》对复兴儒学,传播儒家精神和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和长久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国学大师钱穆把《近思录》看成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七部基本经典之一(其余六部分别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坛经》《传习录》),其地位之高,由此可见。

三

《近思录》自问世后,注家不断。南宋叶采《近思录集解》:“其诸纲要,悉本朱子旧注……有阙略者,乃出臆说。”^⑧故该书虽盛行一时,但失之注解不当,字句讹误。元以后,《近思录》支流曼衍,传本颇多讹舛,特别经明周公恕妄臆穿凿后,该书正文、注语淆乱纷纭,遗误甚多。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张伯行《近思录集解》刊行问世。该书正本清源,依照朱、吕原编,拾遗补阙。又荟萃众说,校勘精当,引据精详,亦参以己意,解析缜密。

本书所据,即以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张伯行《近思录集解》排印本(所据即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福州正谊堂刻本)为底本,参校江永《近思录集注》(《四部备要》本)、茅星来《近思录集注》(《四库全书》本),对全书作标点、注释与今译。

关于本书的“译文”部分,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我译《近思录》基本原则,大致说来,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力求完整、准确地表达原文每句话的原义。古人用字简明,如果机械地都以直译处理,不但往往辞不达意,无法表述原文的含义,而且容易使译文

显得生硬、僵滞,缺少连贯性,甚至还可能违背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和规范。因此,在无法直译的情况下,我采用意译。例如,《治法第九》9·3条中的所谓“十事”,只可意译。直译只能让读者不知所云;对译者来说,只能说的不负责任,无法驾驭。意译以准确为目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累赘与敷衍。第二,本书基本上属于哲学著作。对于常用的哲学术语与概念,如“天”、“性”、“命”、“道”、“理”、“形而上”、“形而下”等等,原则上不译,因为是不可译的。要译,也是根据具体语境的需要,使之更具准确性、具体性。例如,“理”可根据行文中的特定含义,译为“道理”、“合理”、“天理”、“义理”等等。第三,尽力使译文流畅、通俗,尽量使文字显得生动、贴切,能简单明白就简单明白;决不故弄玄虚,决不做晦涩聱牙之词,尽可能不拖泥带水。

上述三点,有的是我可以遵守的,有的只是我的主观愿望。然而,要做到译文的准确、流畅、优美,要使译文达到“信”、“达”、“雅”的统一,不是只凭主观愿望就能实现的。但是,这种愿望已经对我产生鞭策使用,虽然它离实际结果相距尚远。

对于本书“注释”部分,这里也需要谈一点我的感受。

据我所知,迄今为止,《近思录》还没有出现一部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注释作品,这给我的注释工作带来较大困难。生僻的字词、专门的术语、历史人物和事件等等,当然是要注释的。但相对来说,困难不太大,认真查阅正具书和有关资料,进行比较、甄别、提炼,就可以解决。对我来说,真正困难的是对原书“引文”的辨认,标明其出处。《近思录》引用大量儒家典籍和部分古代文献,却几乎不标明其来源,我所据的底本张伯行《近思录集解》对部分“引文”也只是粗略地提示,并不指明准确的出处。这一点,在古人自是当然。古人对典籍烂熟于心,没有必要对常识性的问题多费脑筋。但时过境迁,过去的常识在今天就成了学问。我虽然对儒家典籍有所涉猎,但浅陋如我辈,岂敢望古人之项背!古人一目了然的东西,在我,却是一种辛苦的求索。因此,在缺少现存参照可用的情况下,我只有以勤补拙了。具体说,在有提示的情况下,我依据《近思录集解》提供的线索,按图索骥,通常能够达到目的。但有时候,要准确找出“引文”的出处,往往需要通读一本书甚至两三本书,因为提示往往含糊,你不能确定它出自何部典籍。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我只有依据自己的经验,处处小心,以

避免该标明出处的地方有所遗漏。显然,这一状况更加麻烦,更加难以把握。

注释的甘苦,我自己知道。虽然我总是孜孜矻矻,但疏忽与遗漏,依然是可能的。对于此,我当然不能推卸。

此外,每卷开头有“说明”。大致阐述每一卷的基本内容,一定意义上具有题要作用。“说明”立足客观化,以宋儒的价值立场为准。个别篇幅,稍有一定评论,但依然以客观实际为原则。

凡“说明”所引原文,出自本卷条目者,一律不注明出处。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精神支柱。了解儒学,是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途径。《近思录》作为一代大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和张载的思想精粹,代表儒家哲学发展的又一高峰,其价值自不待言。正是本着对“生机勃勃的传统是创造性的源泉”(海耶克语)这一深邃智慧的认同,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挚爱,以及弘扬中国文化真精神和消解伪历史浪漫神话的迷信的需要,我注译了此书。注译过程中,虽不敢懈怠,但由于才力不足,疏漏讹舛之处难免,祈请专家、学者和读者赐教。

于民雄

1998年11月8日

注释

- ①《宋元学案》卷四八。
- ②《朱子语类》卷一。
- ③《朱子语类》卷十二。
- ④《宋元学案》卷五一《东莱学案》。
- ⑤《近思录·观圣贤第十四》。
- ⑥《宋史·程颐传》。
- ⑦《近思录·观圣贤第十四》。
- ⑧《近思录·道体第一》。
- ⑨同上。
- ⑩同上。

- ⑪《近思录·为学第二》。
- ⑫《近思录·致知第三》。
- ⑬《近思录·为学第二》。
- ⑭同上。
- ⑮同上。
- ⑯同上。
- ⑰同上。
- ⑱同上。
- ⑲《近思录·存养第四》。
- ⑳同上。
- ㉑见《近思录·存养第四》及《克治第五》。
- ㉒《近思录·家道第六》。
- ㉓同上。
- ㉔同上。
- ㉕《近思录·出处第七》。
- ㉖同上。
- ㉗《孟子·公孙丑上》。
- ㉘《近思录·政事第十》。
- ㉙《近思录·治法第九》。
- ㉚《近思录·治体第八》。
- ㉛同上。
- ㉜《近思录·教学第十一》。
- ㉝同上。
- ㉞《近思录·警戒第十二》。
- ㉟同上。
- ㊱同上。
- ㊲同上。
- ㊳《论语·为政》。

⑳宋以后，儒、道、释具有合流趋势。宋儒以儒学为宗，批判、吸收佛道思想，从而导致理学出现，基本为学界共识。但从宋儒的价值立场看，宋儒对佛老是持否定态度的。明代大儒王阳明认为，佛老出世思想，与儒家入世精神格格不入，但在形上层面上，佛老与儒家同源。但仅就后者，宋儒亦持否定立场（见《近思录·辨异端第十三》）。

㉑《近思录·辨异端第十三》。

㉒《近思录·观圣贤第十四》。